

石之瑜

## 社會科學知識新論—— 文化研究立場十評

黃俊傑 /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石之瑜教授將他近年來在各地講學所撰寫的論文，彙集成為專著，題曰：《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承石教授的好意，先讓我拜讀全書稿本，並希望我寫一些讀後感言，我深感榮幸。

這部書在五編共十章的論述中，涉及的課題至為廣泛，但是，全書各章都環繞著一個主題：**對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具有主流論述地位的科學主義之批判與反省**。石教授在本書各章通過對於科學主義研究方法論及其實踐的批判，企圖解構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主流論述及其霸權結構，強調文化研究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從而喚醒社會科學工作者對於「他者」的平等對待，以及對於弱者（如少數民族）的關懷之情。石教授在本書各章的論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略帶後現代主義的文風之中，處處顯示他對於科學主義的不滿，也流露出他的悲天憫人的胸懷。我的專業領域是東亞思想史，我是一個社會科學的門外漢，對石教授這部書中有關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問題，我完全沒有發言的資格。對於石教授的諸多論點，我也不能贊一詞。但是，在通讀全書書稿之後，我深深覺得這部書對於「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或「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工作者而言，確實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課題與論點，其中最具有方法論意涵的有以下兩個問題意識：

**第一個問題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裡，「中國研究」對於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有何意義？**石教授在本書各章的討論中，時時激發讀者沉思這

書名：社會科學知識新論——  
文化研究立場十評

作者：石之瑜

出版者：國立台灣大學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5年

一個重要的問題，例如石教授在本書第二章以孟子(371?-289?B.C.)的「魚」與「熊掌」的比喻，批判以科學主義為基礎的主流社會科學理論建構者，就像蜘蛛結網一樣地，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創一個天地，又被這個天地所圍限的困境。因此，石教授在第三章提出，作為方法論的全球化論述，正是在於引導在地人思考自己在全球格局中應有的位置，從而加強人的自我理解與自我實踐。石教授在本書第四篇的第七及第八兩章，更進一步引導讀者深思「中國研究」對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研究的新意義。

關於這個問題，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界業已有所碰觸，但是在那一個歐風美雨挾其船堅炮利強力沖擊中國思想海岸，中國知識界新舊失衡、中西斷裂的時代裡，中國學者思考這個問題常不能免於激越之言論。舉例言之，哲學家熊十力（子貞，1885-1968）認為西方社會學說不適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廣文書局，1970，卷2，頁67-68），社會史家與思想史家侯外廬撰寫《中國古代社會史》，卻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恩理論的亞洲版本之註腳（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上海：中國學術研究所，1948，〈自序〉）。這些針鋒相對的意見隱約間指出：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歷史經驗之間存有某種緊張性，不是中國屈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就是完全將中國經驗視為社會科學普遍理論的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激越的兩極意見稍獲紓解。1960年代初，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曾邀請美國著名漢學家勒文遜（Joseph R. Levenson）、萊特（Mary C. Wright）、史金納（George W. Skinner）、弗里曼（M. Freeman）、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崔啟德（Denis C. Twitchett）及蕭公權先生等人，各撰專文討論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之關係，集結成：“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刊於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I:4 (Aug., 1964), pp. 505-538; XXIV:1 (Nov., 1964), pp. 109-114。這些戰後優秀的漢學家都認為「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應密切合作。國際漢學界上述這種理想，事實上並未能在漢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實務上充分落實，所以已故人類學家張光直（1931-2001）在1994年仍不免吶喊：「為什麼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張光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該擠身世界主流〉，《亞洲週刊》〔香港〕，1994年7月10日，頁64）。現在石之瑜教授所撰寫的這部書，以更為鮮明但更為深刻的方式，重新提起這個問題。從方法論的立場而言，我很同意石之瑜教授建議通過文化研究而批判、矯治社會科學主流論述，並補其所不足。更具體地說，任何社會科學理論如果不能充分地將中國數千年的經驗納入考量，並能解釋中國經驗之所以然，則這種理論就欠缺普遍必然性，而終不免成為一偏之見。

我們以歷史社會學家埃森西塔（S. N. Eisenstadt）為例闡釋這項看法，埃森西塔著有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39)一書，此書也有中譯本：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系統》（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此書企圖對世界史上所見的各大帝國之政治系統，提出一套圓融的解釋。

埃森西塔的學問與二次大戰以後的歐美政治學的思潮桴鼓相應。傳統的政治學研究主題大多重視各國靜態的政治制度而較少涉及政治行為與政治過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系統的運作及其過程，一變而成為政治學研究之主要課題，諸如「投入—產出」(input-output)、「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系統」(political system)之類的名詞乃應運而生，人人耳熟能詳。首先將「系統」這個觀念用來構成一個理論系統的是大衛·伊士敦(David Easton)，他的《政治系統》(The Political System)一書於1953年問世。埃森西塔的政治系統論與伊士敦、阿爾蒙(G. A. Almond)、阿卜特(D. F. Apter)等人的學說關係密切。埃森西塔的《帝國的政治系統》一書從政治系統論出發，研究人類歷史上實行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政治帝國的政治系統。埃森西塔主張：歷史上的官僚帝國的統治者，居於政治系統的最高層，發號施令，運用社會資源。埃森西塔分析帝國的政治系統之時，非常強調治水事業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古代帝國政治運作的重要性，他認為水利事業是中華帝國的基礎。但是，埃森西塔所建構的「帝國政治系統」理論，由於他對中華帝國歷史經驗的不熟悉，而出現嚴重的破綻，我過去

曾有所討論（參看：黃俊傑：〈埃森西塔對帝國的政治系統之研究及其對中國歷史之解釋〉，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157-186）。

相反地，如果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者，能夠將中國歷史經驗納入考量，那麼，其理論的周延性與普遍性必然大為提升。二十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分析世界近代史上的社會革命的論著，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史柯普將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經驗，放在比較的視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許多創見，對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學說，既加以吸納融會，而又提出修正。史柯普的書之所以能在社會革命理論中有所創新，主要可以說得力於她在西方歷史經驗之外，再將中國經驗納入考慮，從而在三個革命經驗中既求其同，又見其異。從史柯普的例子，我們看到了中國經驗在建構社會科學理論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參看：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我舉埃森西塔與史柯普兩位社會科學家為例，說明中國經驗對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石之瑜教授這部書的許多論點，都啟示讀者：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裡，社會科學必須更加注意具體性與特殊性，才能更具有普遍必然性。我想在這裡進一步強調的是，石教授

在這本書中時時涉及的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新思潮，多半源起於歐洲或北美，較少以中國歷史經驗以及當代東亞社會政治情境作為論述之參照系。因此，石教授所強調的「文化研究」，應特別強調東亞（尤其是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才能使社會科學論述的「普遍性」不流為「霸權論述」，也才能同時照顧理論與實踐兩個面向。

石教授這部書引導讀者深思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研究」的知識論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界特別值得反省。石教授呼籲應將「中國研究」作為對象加以研究，他在本書第七章開宗明義的指出：所謂將中國研究領域當作研究對象的意義有兩層，一是將既有的中國研究文獻蒐集，進行文獻的比較分析，既比較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也比較理論角度、歷史分期與議題種類等。另一層是比較研究者的身分與位置，反省研究者所從出的歷史脈絡、生活經驗與專業訓練對研究活動的影響，並追問研究者所屬機構的性質和研究經費的來源。必須對中國研究本身進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體會中國研究者所提出的相關知識，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石教授進一步闡明他所謂「以『中國研究』作為研究對象」，所涉及的問題：首先是問，關於中國作為研究對象，是什麼意義的對象？亦即本體論的探究，可大別之為無本體論與有本體論。其次是在有本體論的預設下問，關於本體的知識是主觀的或客觀的？再其次，是在客觀知識的預設下

問，中國相關知識是屬於普遍性知識的一環，或是不可與其他知識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對性知識？接著，是在普性知識的預設下問，這個知識是否具有歷史終極目的與通往目的之單一途徑。第五，是在線性歷史目的論的預設下問，取得中國知識的方法論依據，是自由經濟制度主義的問題意識或唯物階級史觀？最後，是在自由經濟制度主義的方法論預設下問，採用歸納的歷史方法或演繹的理性抉擇方法，之間有何實踐意義上的差別？

石教授以上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在海峽兩岸人文社會科學界尚未獲得充分的注意，但在日本知識界卻有許多學者進行過嚴肅的思考，可以作為我們反省這些問題時的「他山之石」。

日本研究魯迅（1881-1936）的著名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曾有一篇題為〈作為方法的亞細亞〉的演講稿（竹內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收入：《竹內好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第五卷，頁93-94），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溝口雄三（1932-）撰有《作為方法的中國》（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李甦平等譯：《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2-3）一書，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子安宣邦（1933-）也有《作為方法的江戶》（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戶》，東京：ぺりかん社，2000）一書，對於思考亞洲、中國或日本的方法，都各自提出一套看法。

竹內好等三位日本學者對於「亞洲（中國、日本）應如何被思考？」

這個問題的意見，固然互有出入，而且溝口雄三曾批判竹內好對中日兩國近代以前的歷史缺乏瞭解，子安宣邦也不滿意溝口雄三對近代中國革命在感情上過度的投入，但是，這三位日本學者都有心於跳出近代西歐「近代化」的模式，重新解讀東亞近代的歷史經驗。竹內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從孫中山（1866-1925）到毛澤東（1893-1976）的革命，是在摸索中國模式的近代化道路，而不是照搬歐洲的經驗。竹內好認為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的「方法」，有助於亞洲人正視亞洲經驗之特質。溝口雄三認為，思考近代中國的發展，必須注意其異於歐洲的特質。他強調，世界史的普遍的面相，只有通過個別的獨特性才能獲得彰顯（參看：溝口雄三：〈「中國の近代」をみる視點〉，收入：《方法としての中國》，頁3-35，尤其是頁30）。溝口雄三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的研究願景（同上書，頁137）。子安宣邦批判過去有關江戶時代日本的研究，常以近代西歐作為參照系。他認為應從江戶時代內部重新解讀江戶。

竹內好等日本學者所謂「作為方法的亞洲」、「作為方法的中國」以及「作為方法的江戶」的提法，與石之瑜教授所謂「以『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提法，有其同調亦有其異趣。雙方之所同者在於：石教授與日本學者一樣地，都有心於超越並揚棄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霸權論述」，他們都不滿於以近代西方發展經驗為基礎的一元化的、不能容忍「異己」的研究立場與視野。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之內嚮往一個多元多樣，五彩繽紛，「萬物

靜觀皆自得」的多元世界。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中，諸多主體之間（包括個人、國家、文化等）呈現牟宗三（1909-1995）所謂「並列原則」而不是「隸屬原則」（參看：牟宗三：《中國文化的省察》，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頁68）。這是一個富有後現代意趣的文化世界與學術世界。

再進一步來看，石之瑜教授與這三位日本知識界知名學者之間仍有其重大的差異在焉。石之瑜教授所謂「以『中國研究』作為研究對象」，他所關心的是「中國研究」學者的「身份」和「位置」，亦即研究者的知識論基礎、階級立場、價值定位等研究活動的「內在」問題。石教授在本書第一章對這些問題有詳細的討論。但三位日本學者所謂「以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作為方法」，所關心的焦點在於揚棄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並從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出發思考。他們企圖發掘並突顯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之不同於歐洲的特質，從而建立亞洲（中國或江戶日本）的獨特性與自主性。他們思考亞洲（中國或日本）研究的相關問題，比較偏向於研究活動的「外部」問題。

以上是我誦讀石之瑜教授這部新書時，從我的研究領域出發所看到的這部書所激發的兩大問題，以及它們對我個人思考上的啟發。就其整體而言，本書是一部充滿作者慧識的作品，值得不同學科背景的讀者細讀。

黃俊傑